

张建华：《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俄国史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PP.282-302.

## 第十三讲 潜流：思想文化界的多元思潮与政治迁变

意识形态问题在苏联历史上从来都置于首位。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制度、政党政治以及相关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方面。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也属于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50-80年代，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问题特点鲜明，值得关注。尽管勃列日涅夫政府大大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事与愿反，政治和经济的停滞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停滞，导致了作为主流文化的苏维埃文化的停滞，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停滞。出现了与僵化的意识形态相伴随的“夜间人”现象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苏维埃文化已经受到苏联社会的普遍怀疑，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载体的非主流文化如同深水之潜流一般滋长并汇集。

在这一讲中主要谈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冻文学”与“解冻思潮”。第二个问题：知识分子与大俄罗斯主义。第三个问题：双重文化背景下民族知识分子。第四个问题：书报检查制度。第五个问题：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六个问题：“夜间人”与“60年代人现象”。第七个问题：本讲小结。

### 一、“解冻文学”与“解冻思潮”

1954年5月，《旗帜》杂志发表了作家爱伦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不久，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其以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等文种在国外发行的机关刊物《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翻译并连载了这部小说。小说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9月25日出版的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文章，她指出：“爱伦堡把他的小说命名为《解冻》，这就有意无意地宣告作者要选择一种重大的题材。我们大家分明感觉到生活正在‘解冻’。”时任苏联作协总书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著作作家西蒙诺夫在1954年7月17日和20日出版的《文学报》上连续发表长篇文章《爱伦堡的新的中篇小说》，对《解冻》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对苏联生活，特别是文艺界的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爱伦堡地同年8月3日出版《文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康·西蒙诺夫的一篇文章》，回应和反驳了对他的批评。1956年苏共20大后，《解冻》第二部也得以出版。西方评论界十分欣赏这部小说，称它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先声。在他们看来，这部小说的发表是苏联文学发展的划时代的标志，因此，他们常常用“解冻”来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学中的自由化思潮。

按照苏联文学界的评论，爱伦堡尽管长期从事文学创造，但并非苏联第一流的作家，他为人知的职业是苏联驻欧洲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解冻》这部作品也并非艺术水平极高，但它恰逢其时地出版于赫鲁晓夫大改革的年代，并且成为赫鲁晓夫推行改革的一个先声。

小说没有象40-50年代最常见的作品那样把笔墨集中在如火如荼般的工业和农业领域，而是在放在个人的道德伦理冲突上，反映了普通人对爱情和幸福的理解。伏尔加流域的一座城市的工厂厂长茹拉甫辽夫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一味追求生产指标，以此取得上级领导的赞赏，而对群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长期让工人住在破木棚里。茹拉甫辽夫对有关风暴的天气预报置若罔闻，在暴风袭击下工棚倒塌，因事故而被撤职。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热爱工作，主持正义，在厂党委会议上批评了茹拉甫辽夫，厂长为此怀恨在心，便在人们中间诬陷他历史上有污点。索科洛夫得知茹拉甫辽夫对他的诬蔑后，病情加重了。当索科洛夫闻悉厂长茹拉甫辽夫因失职被撤了，他的精神顿时感到解放，他第一次推开病房窗户，他发现大地解冻了。他欣喜地说：“你看，解冻时节到了。”

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普遍欢迎，印有小说的杂志《旗帜》马上脱销，随后加急印刷的小说单行本

也被销售一空，这一现象表明，《解冻》的内容和它所代表的社会情绪高度融合了。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经容许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人民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在报上和文学作品中已开始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的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文学艺术界最活跃的思潮。法·杜金采夫批判官僚主义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夫·奥维奇金的《艰难的春天》、法·菲·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杰·格拉宁的《个人意见》、帕·尼林的《冷酷》、雅·亚申的《杠杆》陆续得以发表。

1957年和1959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展了两次关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通过争论，批评了卫国战争结束以来影响文学艺术界的“无冲突论”和“粉饰生活”的观点，修正了30年代以来通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拓宽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路，吸收了各种文艺流派和方法。1964年召开了“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问题”讨论会，1966年召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讨论会，探讨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古代文学流派与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关系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世界艺术发展史合乎规律的新阶段的观点。

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作家的文学创作日趋繁荣和多样化，其特点是既写英雄业绩，正面人物，也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电影界也迅速地作出了反映，在继承革命电影优秀传统的前提下，一改过去银幕形象单一、正面人物完美无缺、脸谱化等弊病，创作出了一些优秀影片，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他们对于苏联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产生了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新变化。在大量的国产影片中，除了《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堂吉珂德》《哈姆雷特》等名著被搬上银幕外，一些反映战士日常生活的电影，如《雁南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也登上银幕。苏联著名导演瓦·舒克申在1973年完成的《红莓》引起了苏联艺术界的关注。著称导演梁赞诺夫的《办公室的故事》（1977年）《两个人的火车站》（1982年），弗·缅绍夫导演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79年）不仅得到苏联观众的赞扬，而且在许多国际电影节上赢得大奖，在一些国家受到欢迎。

1961年苏共22大再次公开批评了斯大林，在制定的《苏共纲领》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以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后来也成了文艺界的口号。于是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这对于推动作家更深入地把握现实，观察个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更多方面地表现人是有帮助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41年毕业于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同时是莫斯科大学文学系的函授生。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59年，他创作出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写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劳改营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其中的生活阴森可怖，看守粗暴无情，犯人都是受冤的人。

小说寄到了著名的文学期刊《新世界》，并引起著名诗人、《瓦西里·焦尔金游地府》的作者同时也是《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注意。特瓦尔多夫斯基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决定发表这部作品。他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这部苏联的第一部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转交给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非常欣赏这本小说，并建议立即发表，1962年第11期的《新世界》全文刊登了这部小说，小说改名为《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2天之内的被抢购一空，而且还有许多人争相订阅。当时杂志只有9400册，后来杂志出了2版单行本，发行达80万册。

索尔仁尼琴立即被接收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

据《真理报》（1963年3月10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了两本书，一个是全会的材料，另一本是《新世界》（第11期）。索尔仁尼琴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的当时心情：“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伊万·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受到公开批判，索尔仁尼琴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只能选择在国外出版。索尔仁尼琴因此于1969年11月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迫于政治压力，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先是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定居美国。

## 二、知识分子与大俄罗斯主义

在苏联历届领导人将俄罗斯民族视为“母亲民族”“领导民族”之后，“官方俄罗斯中心论”已成为苏联的现实存在，并且对苏联社会产生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助长了俄罗斯民族之中的大民族主义意识，而部分俄罗斯族的知识分子刚首当其冲，对大俄罗斯主义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德学者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是一次新革命前夕吗？》中曾指出：“在俄罗斯共和国里滋长着一种优越感，它赋与‘俄罗斯’和‘俄国’这两个概念这样一种意义，使人回想起革命前的时代，而且甚至具有一定的沙文主义特点。”

在20世纪30年至4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俄罗斯爱国主义被渲染到空前的高度，1939年出版了波·马·沃林的小册子《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作者相信：“苏联各民族有理由以自己的老战友为骄傲……苏联公民——俄罗斯民族站在苏维埃大地上的所有其他民族的前列，准备为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献出生命直至最后一滴血。”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金公开表示他不能用国际主义风格去创造，他要“按我自己的俄罗斯性格，或者我自己的俄罗斯乡村气息，或我自己的俄罗斯民族风格”进行创作。

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的两大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现了“俄罗斯”和“祖国”俱乐部，在社会上影响较大，这两个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公开宣扬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1965年，莫斯科市团委负责人维·斯库尔拉多夫编写了《风俗守则》一书，在莫斯科团市委的积极分子中广为流传，他在书中提出伟大的“俄罗斯种族”担负着“人民的宇宙使命”和对“祖先的责任”，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种族的纯洁，提出要对“委身于外国人的俄罗斯妇女做绝育手术”，这份材料在俄罗斯族共青团员和青年人中间引起极坏的影响。麦德维杰夫认为维·斯库尔拉多夫等人的活动得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等权威机关的公开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其著作《论社会主义民主》中批评：“俄罗斯主义者的说教在这里被当成‘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预计，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由于遇到广大士兵和青年日益增长的不问政治的倾向，遇到青年对庸俗化和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失去兴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现有形态越来越落后于新时代任务的需要），许多军队的政工人员和青年团的工作人员试图依赖于更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他们不是从国际主义而是从民族主义出发，力图让民族排他性的概念起死回生。这样，在我们的青年中，正在发展着那样一种

完全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爱国主义。”

西方学者注意到从60年代末开始，苏联国内出现了“斯拉夫复兴运动”。西方报刊发现苏联民间各界大力挖掘“老沙皇的遗产”，已达到“全国性狂热程度”，“最近一些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的历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爆发出了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从40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的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界就弥漫着一种极其不健康的气氛，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即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不尊重历史事实，唯心主义地曲解历史，竭力美化沙皇政府和俄罗斯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侵略与兼并。

1962年12月，苏联政府专门召开全苏历史学会议，将宣传“各民族人民归并俄国的进步意义”确定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并且要以此精神编写出新的历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随后，苏联通史、专题历史、加盟共和国历史著作大量出版，相当多的历史著作中的观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40年代出版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中认为：“哈萨克沦为殖民地标志着哈萨克民族独立生存的结束和纳入军事封建的剥削体系，这一体系是沙皇为其统治‘民族监狱’里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而建立的。”而50年代出版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中则改为：“俄罗斯兼并哈萨克对哈萨克人民在关键时候的历史命运有着进步的意义……它使哈萨克人民从准葛尔封建头子的奴役下得到了解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1943年版在评价哈萨克历史上著名的克涅萨里·卡里莫夫起义时，基本观点是“这次起义是以前历次运动的综合，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是在俄国沙皇整个殖民政策时期内哈萨克人民最大的一次起义。哈萨克人民用他们热爱自由和战斗的精神有力地、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民族独立。”然而该书1957年版中对卡里莫夫起义的评价却发生重大变化，给这次起义所定的性质是“反动的，具有封建和君主色彩的，它的目的是阻止哈萨克人民前进，加强封建和家长制度，使哈萨克与俄罗斯和与俄罗斯人民隔绝关系。”

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沙皇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血腥镇压和经济掠夺变成了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行为。他们认为：“把先进的俄罗斯文化对吉尔吉斯人民的良好影响仅仅归结为吉尔吉斯人民学会了粉刷墙壁，使用刀叉、床铺、茶炊、悬挂窗帘，这是对最重要问题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19世纪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统一的巨大的历史意义表现为巨大的力量。”“对于白俄罗斯来说，复归俄罗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这一行动加速了白俄罗斯的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关系的解体和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长。”“由于中亚合并俄罗斯，才使这一地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摆脱了落后的封建主、土耳其、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但是尽管有沙皇制度的殖民压迫，中亚归并俄罗斯仍然是进步现象。对于中亚人民来说，归并俄罗斯是接近俄罗斯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开始。”“波罗的海归并于俄罗斯完成于18世纪末，在立陶宛的历史命运中起到了进步作用，因为它在客观上符合立陶宛民族历史发展的利益，使它们摆脱了日耳曼人统治者。”

在苏联思想文化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就“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传统”展开广泛的学术论战，最终的论战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先后有政府要员、工人代表、劳动英雄等阶层人士参与论战。论战的逐步升级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对“爱国主义”和“俄罗斯传统”不同的理解背后隐藏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阴影。论战是由文学期刊《青年近卫军》和《我们的同时代人》上发表的维·恰尔马耶夫和斯·谢马诺夫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引起的。恰尔马耶夫在《青年近卫军》（1968年第9期）上发表了《伟大的探索》和《不可避免性》，文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由反西方的立场引申出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他认为俄罗斯帝国留给了俄罗斯民族宝贵的民族遗产，彼得一世建立的绝对专制君主制是其重要内容，他甚至将尼古拉二世时代的维·罗查诺夫和卡·列昂节夫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黑色百人团的沙文主义言论视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财富。他抱怨俄罗斯民族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高度重视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所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在论战中，另一篇引起反

响的文章是《青年近卫军》（1970年第8期）上发表的谢马诺夫的《论相对的和永恒的价值》，与恰尔马耶夫的文章不同，谢马诺夫文章的立足点不是赞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民族财富”，而是刻意提醒“还有那些最近50年来，特别是我们伟大的革命所创立的东西。因为，这个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我们苏联公民……为伟大的俄罗斯革命感到骄傲，这个革命为整个世界，为祖国的命运开创了新的时代。”在文中他多次强调十月革命、集体化、工业化、卫国战争的胜利都是俄罗斯人民的事业，而“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的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品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对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的人民，对在光着脚板、缺乏口粮情况下建立起巨大工业基地的人民，对哺育了紧握手榴弹冲到敌人的坦克底下，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儿女的人民，我们是不能不为之骄傲的。由此可以得极为重要的、适用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的价值标准，而且我敢说，这是绝对的标准。”他的结论是：“我认为，至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时期巨大转变的全部意义。”

俄罗斯族出身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派别的代表人物，他在“努力锤炼、调整、净化自己的灵魂”和“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之后，首先感觉自己“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员”，他认为：“自尼康和彼得大帝的毫无人性的改革起，俄罗斯民族精神开始受到压制和根绝，我们忏悔的能力亦开始枯萎、干涸。”他谴责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批判苏维埃政权的非人道主义的作法，号召俄罗斯人民为自己麻木不仁的态度进行忏悔。但是，他同时强调“俄罗斯人受害不比任何人差，实际上他们是首当其冲受到攻击。”在他1973年发表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他向苏联政府呼吁应该重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信念与民族意识，他认为“强大的美国之所以输给了弱小的北越”，是因为“美国民族意识太弱，太不发达”，因此与其进行索然无味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不如进行俄罗斯爱国主义启蒙。他希望苏联领导人们“不会容不下自己的血统、父老和故土，不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漠不关心。”

在苏联政府和苏联社会中对这种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是有不同意见的，拉·帕·列尔特对谢马诺夫和恰尔马耶夫等人的思想持完全否定态度，他在《论鞭子的可爱》中写道：“伪造历史，继而恢复俄国沙皇制度的名声，这只有斯大林的30年代摧毁了苏联的历史科学之后才变得有可能。因为，多年来，那些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指令的‘思想家们’，在颂扬俄罗斯人民的幌子下，实际上所干的正是在为俄国沙皇制度恢复名誉。谢马诺夫、恰尔马耶夫和其他‘新斯拉夫主义者’宣传有理由感激斯大林。把民族的独特性和一国人民的卓越的思想强行纳入与之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在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条件下是轻而易举的。沙文主义附和自然的民族自豪感（而人民确实有可骄傲的地方），并利用它来很容易地剪裁历史……国际主义成了为‘伟大机缘’装潢门面的东西……这个当年被斯大林灌输到苏维埃史学中、如今又被谢马诺夫等人得心应手地发展了的学说，乃是最平庸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论调，连阿拉克切耶夫、波别多诺斯采夫和斯托雷平等人也会对他的说法五体投地了。”列尔特强调谢马诺夫和恰尔马耶夫等人沙文主义思想的严重危害，并且预见它的危害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且将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正像所有的大国沙文主义一样，它们会在少数民族中引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响，并对被谢马诺夫们宣扬为最优秀的起领导作用的人民产生警惕和不信任。谢马诺夫代表这个人民说话，（尽管人民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权力）宣称其全部以往的历史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感情既无助于国际主义教育，也不能促进国家的巩固。”杰明捷耶夫在《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传统和人民性》，文章围绕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发表意见，认为“爱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有“争取解放斗争的爱国主义”，也有“护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他提出应该“把保卫祖国独立的正义战争与沙皇的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他称恰尔马耶夫的语言是不折不扣的“斯拉夫优秀人种论的语言”。然而列尔特和杰明捷耶夫的文章在一片沙文主义欢呼声中成为“不和谐的”声音，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众多学者和群众的批评。《社会主义工业报》（1969年7月31

日)上刊登了苏联劳动英雄扎哈罗夫给《新世界》杂志的公开信,以俄罗斯工人的名义要求杰明捷耶夫对自己的言论做出“党性的回答”,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因发表杰明捷耶夫文章而受牵连的《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被迫辞职。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历史学博士亚·雅科夫列夫在《文学报》(1972年11月15日)上发表题为《驳反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批评了索尔仁尼琴和恰尔马耶夫、谢马诺夫等人宣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谴责他们的思想是“用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代替民族自豪感,将爱国主义变成了沙文主义。”认为他们是“美化专制制度下俄罗斯的生活、风尚和习惯”,是“公开敌视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表现。”但是也因此而得罪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头们,违背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指示,最终被免去意识形态部门的重要职务。杰明捷耶夫的被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辞职、雅科夫列夫的被贬,反映了该时期苏联社会各个部门和各个阶层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势力的严重。

### 三、双重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知识分子

民族知识分子是苏维埃制度的产物,民族知识分子队伍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伴随着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形成的。据统计,1965年——1981年间,全苏受过中等和高等专业教育者平均增长2.4倍,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增长了2.6倍,在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增长了3.7倍,在立陶宛、摩尔达维亚、塔吉克斯坦增长3倍,在乌兹别克斯坦增长3.1倍。1965年——1981年间,全苏科学工作者人数增长2.1倍,在爱沙尼亚和亚美尼亚增长2.5倍,在白俄罗斯增长2.6倍。同时期,全苏医生的数量增长1.9倍,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增长2.2倍,在塔吉克斯坦增长2.5倍,在乌兹别克斯坦增长2.7倍,在立陶宛增长2.3倍。同时期,全苏教师数量增长1倍,在吉尔吉斯斯坦增长1.4倍,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增长1.5倍,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增长1.6倍。从以上数字中可以看出,非俄罗斯族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中高等教育和从事科学方面专业人数增长的比例都大大地高于全苏平均水平。这些民族知识分子活跃在苏联的文化、教育、艺术和科技领域,在全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许多人通过自身的优异工作成绩而跻身于各级各类党政机关、苏维埃和军队等重要的职能领导机构之中,在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政府也有意识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树立一些民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且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参与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和文化活动,以显示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巨大成绩。

这些民族知识分子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之外,一般都熟练掌握“族际交流语”——俄语,一些人还直接用俄语从事科学著作的写作和创作文艺作品。一些居住在非本民族共和国境内的民族知识分子甚至在学习生活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完全同化于当地的主体民族(一般是俄罗斯民族)。因此民族知识分子不仅是苏维埃制度的产物,而且往往是苏联政府民族融合政策的突出成绩之所在。从这个方面来讲,民族知识分子是苏维埃政权的受益者,也是苏维埃制度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和社会地位是与苏维埃政权密切相联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知识分子是苏联政府沟通与各非俄罗斯民族关系的中介者,也是苏联政府影响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进程、加速民族融合过程的主要依靠者,即苏联著名民族学家查麦梁评价的,“苏联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苏联人民的忠实助手。”在“族际文化”的思想和道德体系中,民族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往往归属“苏联人”的意识,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起重要作用是苏联政府所提倡的“族际主义”观念。

但是绝大多数的民族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本民族中或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境内,即他们生活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的氛围之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受的仍然是本民族的感情、民族生活习俗、民族语言和文字、民族宗教信仰,因此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仍然受民族价值观念和民族道德观念的约束。白俄罗斯著名诗人马·唐卡说:“白俄罗斯诗歌,没有丢掉自己的独特性,而且越来越理性和包罗万象化,尽管我们的一些批评者们总是在那样

一些玩传统的扎列克管的乡下小伙子的伴奏下随意改动它。”既使是被苏联政府树立为同时以民族语言和俄语创作的典型人物、吉尔吉斯族作家契·艾特马托夫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力图回忆的不是民族‘装饰图案’，而是提出民族日常生活存在的问题，力图洞察社会冲突和矛盾。”因此，在更多的时间里，民族知识分子是生活在“民族文化”的思想和道德体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往往首先归属于本民族的群体意识，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观念。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生活在双重文化体系中民族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关心苏联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关注于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影响他们思想感情和政治态度的不仅有“族际主义”（国际主义）观念，而且还有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在他们的思想中，“族际主义”观念和民族意识不是绝对平均和永久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的外界条件刺激和主观的自身情感变动而变化。当苏联国家强盛和国际地位强大或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处于重合状态，“族际主义”观念一般居于第一位。而当民族利益被侵犯、民族感情被污辱、民族前途晦暗的情况下，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将会分离，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自然上升到第一位，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对于本民族负有强烈的责任感的民族知识分子中间。当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急剧上升并且与本民族共同体所表现出的群体情绪切合时，则不可避免地演变成民族主义情绪。西方学者注意到：“在最近几年所爆发的民族危机中，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些优秀化合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法国历史学家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中谈到：“事实证明，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物除名字外，已完全被同化到俄罗斯民族中去了。但是同样，也有证据证明，正是这些人物才是他们民族自我意识的代言人，向中央当局提出民族要求的表达者。他们还倡议在自己的共和国内实行有利于自己民族的政策。少数民族精英人物是苏联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维护这种制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制度限制（他们努力使其限制放松）范围之内努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权力和自主……甚至在那些受同化最严重的人中仍然对出身的民族及其传统文化有某种程度上的赞同。而且，真正的同化并非轻而易举，对那些非斯拉夫人尤其如此……一朝为少数民族，永远为少数民族的观念使那些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只有依靠传统遗产和民族选区的选民的支持才能巩固其地位……事实上，民族的战斗性往往是从被统治民族文化高度同化了的精英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

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的一系列失误在客观上导致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剧，促进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加强。在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中大批的民族知识分子被贬、被捕和被杀，卫国战争前后11个少数民族的被强行移居他乡，40年代中期后苏联政府随意解释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沙文主义作法，50-80年代苏联政府强制推广俄语、鼓励移民和民族通婚等加速民族融合和同化的政策都极大地刺激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民族知识分子中不仅出现了一批活跃于国内和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乌克兰的作家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作者）、伊凡·麦斯特连科（《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的作者）、谢列斯特（曾为乌克兰第一书记，因在其著作《我们的乌克兰》中表达了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而被撤职）等等。民族知识分子成为许多民族主义的组织的领导人，如“乌克兰民族阵线”和“60年代集团”、“爱沙尼亚民族阵线”、亚美尼亚的“统一党”等。

#### 四、书报检查制度

意识形态对于苏联国家和社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在苏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在这一体系之中，书报检查乃是最重要的核心机制，在意识形态控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书报检查体制的“预防性检查”和官方的政治宣传运动使苏联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大多数拥护党的政策，而少部分则持反对态度，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对“异端分子”的公开压制引发了长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之后的人权保障运动，也导致了苏联文化的分裂为书报检查下的官方文化和通过“地下出版物”传播的非官方文化。

赫鲁晓夫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保护者，经常参加知识分子的创作聚会，经常显现他在艺术上的无知和政治上的保守。1962年12月，赫鲁晓夫率领党政领导人全班人马参观美术展，年轻的前卫雕塑家涅依兹维斯内作品《警报》当他看到他所认为的“形式主义”的抽象派作品，十分不满，当即就横加指责：“这是诲淫作品，不是艺术。”“就是一头毛驴用尾巴甩，也能比这个搞得更好。”于是，1963年在召开的全苏美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涅依兹维斯内受到了公开批判。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文化艺术作品的检查。

1965年12月11日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些刊物的路线错误以及国内许多作家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的问题，这份报告最后提出了建议，即采取果断措施，对非法出版物一律严打。

联出版总局也提议：“对严重违反出版前材料预备制度的人追究严厉的行政责任……如有泄漏禁止出版的信息，增加作者的应付责任。”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令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鉴于国内外形势变化，更增强了书报检查的严苛性。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1月7日下达的密令《关于加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和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更加表明了政府的立场：“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集体的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出版社和印刷、广播、电视机关以及文艺部门的某些领导对于主题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没有采取尽职的预先防止措施，与创作者之间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好，在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问题上表露出了自身的妥协退让和意识形态无原则。意识形态机关的一些个别领导试图将这方面的责任推给苏联部长会议下的出版业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

对于书报检查制度，最先公开表示反对的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1967年3月16日，索尔仁尼琴寄给第四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一封信，在信中他分析了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历史，批评党、出版总局和克格勃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专横完全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主性，使他们只会听从上面的通告。索尔仁尼琴呼吁更改苏联作家协会规章，消除一切（公开和秘密的）书报检查。大约80名作家响应了索尔仁尼琴的号召，联名给苏共中央去信，要求撤除书报检查。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1967）前夕，一些学者、院士、文人、艺术家约100多人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信息传播与获得法律草案》。该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还要求清除与国际其他国家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人为阻隔。法案力图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权保障问题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信息的传播与获得、限制干涉私人生活、版权保护、以法律手段解决冲突等等。

在出版总局1971年6月29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咨询报告》中，提出苏联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知识分子，正是以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民主运动”。该《咨询报告》预示着70年代前半期对于“政治检查”将进行一系列战略战术改良。这一时期，克格勃在事前检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它采用谍侦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屉”，将所获相关作家的意图和计划的情报汇报苏共中央。主要负责“预防性检查”工作的克格勃机关是其辖下的第五局。在1975年10月31日克格勃的公函《克格勃机关的预警活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苏联公民进行侦察的主要原因便是意识形态监控，在1959-1974年间便有约6万公民曾被“预检”，其中3/4被批评有反苏活动——典型的即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艺术作品”。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索尔仁尼琴被逐事件。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将其驱逐出境。此时，苏联作家协会已经成为书报检查系统中的一环，它实施检查的形式包括“审理”、褫夺发表特许权、限制出版以及最终开除作家协会籍。索尔仁尼琴就是在经历了这些程序之后被剥夺了苏联公民国籍以及流放国外，在索尔仁尼琴之后，这种强迫性的移民国外便成为政府对“反党叛国”文人学者的一种温和镇压，接连有许多此类文人学者都这样被驱逐出境。



1974年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出版总局的新《章程》，该《章程》带有明显的示范性特点，不具有任何原则性的新变化。1975年12月11日，面对国际社会执行《全欧大会最后决议》的舆论，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研讨出版法（根据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科的报告）。出版法草案提出了废除书报检查和维护言论自由。但研讨出版法最后不了了之，反而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出版物”的抵制力度，继续维持严苛的书报检查体制。由于种种对潜在威胁的忧虑，党和政府没有进行对书报检查的改革，因为“消除任何书报检查”对于苏联当时来说是不现实的，很可能导致民心浮动、国家大乱。

为了与出版和电子媒体进行交流和推广政治检查，在苏共中央还常常召开协商会议，会上不仅有对之前意识形态领域所犯过错进行评析，还经常对信息和宣传资料的内容直接下达指令。1977年5月底，在苏共中央宣传部便曾召开了一次出版、广播、电视机关代表协商大会，会上讨论的问题有继续增强政治警惕性和提升媒体领导对出版材料意识形态和政治水平的应负责任。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其领导地位的巩固，他个人集权和新的个人崇拜倾向日益明显。书报检查制度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局势基本符合，仍然完全继续严苛的政治检查，任何试图在没有作家协会和意识形态机关参与下进行自由出版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 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出现了无数个“持不同政见者”团体，他们居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失误进行揭露，其活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产生于十月革命后的20、30年代，复苏于苏共20大后，在勃列日涅夫政治高压时期活跃起来。1965年秋天，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逮捕了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同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有200多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集会者很快被警察驱散，20人被拘留。1966年1月10日，开始对两名作家进行审判，分别判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7年和5年徒刑。判决结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近200个作家联名抗议这次审判。金兹伯格和加斯兰科夫将揭露此案内幕的文件和文章汇集成册，以“独立出版物”的形式秘密印刷并发行。1967年，金兹伯格、加斯兰科夫被捕，1968年1月21日在普希金广场有100余人于此集会，他们的抗议书先后征集了700人签名。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团体表示抗议。同年8月25日，李维诺夫（即在大清洗年代被免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马·马·李维诺夫的孙子）等7人来到莫斯科红场，手持“不许插手捷克斯洛伐克！”“占领者可耻！”的标语牌，以示抗议，后被警察逮捕，后长期监禁。一些知名作家因抗议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党籍和苏联作家协会。

持不同政见者的这两次活动引起了西方新闻媒介的关注，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70年代后，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或是将他（她）们关进监狱，或长期软禁起来，与世人隔离，不许发表作品和演讲，或是强迫他们放弃苏联国籍，自动移居国外。如被称为是“苏联的氢弹之父”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1968年因呼吁苏美合作，以消除核威胁，被解除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职务。1975年挪威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金，但苏联的压力下他表示愿意保留苏联国籍而宣布放弃领取奖金。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是苏联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和政治发展陷于困境的产物，也是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长期维持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情绪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一运动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是30年代以来，固化的苏联体制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的结果。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政策激发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而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的保守又从另一方面加剧“持不同政见者”们的联合。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包括了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流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这一运动基本上处于松散状况，组织性并不强。

按照他们的政治主张来区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派别。第一个是传统派（也称保皇派）。他们既反对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反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主张回到俄国去，甚至主张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去。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派。他们反对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样板，在苏联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即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第三是体制内改革派。他们自称是“党内民主派”和“列宁主义派”，西方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派”。该派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主张应该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扩大政治民主和人民参与程度。持不同政见者中这一派的人数最多，被撤职的前苏军少将帕·格里戈连科、帕·雅基尔（大清洗时代被处死的苏军高级将领约·雅基尔的儿子）、麦德维杰夫兄弟（罗伊·亚·麦德维杰夫和诺列斯·亚·麦德维杰夫）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方式主要是组织公开或秘密的集会，有的人主要从事写作，攻击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在柏林、阿姆斯特丹、慕尼黑、巴黎和美国都有他们的俄文出版社，在国内也有一些地下的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对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大俄罗斯主义提出批评意见。

## 六、“夜间人”与“60年代人现象”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共执政初期发挥了重要的维护执政合法性的功能。然而，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但它并不因此就自动为当时的俄国广大民众所接受，它要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还需要一定得条件。所以，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列宁比其他领导人倾注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列宁看来，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创立的“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sup>①</sup>事实上列宁所强调的“文化革命”，究其实质，就是要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和造就拥护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苏维埃公民”。因此，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明确反对国民教育中的“无党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在他看来，学校应当成为向劳动人民传播共产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工具，“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极其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19年，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首倡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到各地工人的广泛响应，便是一例。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先后战胜各种反对派，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争夺列宁主义的思想旗帜，其本质含义就是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斯大林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阐述和发动对列宁的“造神”运动，把列宁供上神坛。同时他本人便以列宁的继承人和列宁主义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紧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1929年，他在全国城乡发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消灭各种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斯大林称这一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同时，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进攻，最先从哲学领域开始，随后在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开展一系列“批判”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大转变”，改变了20年代初列宁和俄共力图按照意识形态的自身规律领导学术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整套方针，其消极影响遍及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各个部门，甚至危及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发展。

意识形态领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其受重视的程度，在整个苏联74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和苏联历史上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分为两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1—372、32页。

个部分，第一是宣传鼓动，第二是思想斗争。前者是正面的教育和灌输，后者是对各种异己思想的批判和清除。这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任务，早在1963年，苏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就指出：“目前条件下党的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苏共纲领的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思想 and 人们思想中的旧残余发动全面进攻。”不同的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都得到空前的加强。

大学生既是未来掌握思想文化解释权和创作权的知识分子，也是未来苏联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管理者的主要来源，因此苏共极其重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70年代初，大学生每个班都配置了班主任，每个系每个年级还有专人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70年代开始，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综合方案”。有的方案对中学生参加大学的招生咨询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大学毕业后的跟踪教育，都有具体安排。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等等，方案都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外国留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一样列入计划。

1956年10月，根据美国新闻署与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苏美开始互惠发行杂志——苏联在美国发行英文杂志《苏联生活》(Soviet Life)。该杂志接受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其编辑、出版接受苏共中央宣传部的严格监督。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给杂志很深的影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路线被贯彻在杂志中。《苏联生活》介绍苏联人民生活、苏联政府政策、宣传苏联意识形态。这是一份政治性和政策性均极强的刊物，因此刊物上文章除了出自杂志编辑、评论人员之手，也有一些转载和节选自《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等其它报刊。《苏联生活》通过定购和零售的方式在美国等国家发行，在美国每年的发行量为60,000册，另外大使馆还赠送2,000册。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生活》的内容更加充分反映出苏联对外宣传的意图。《苏联生活》杂志的1965年第2期，在“问题和回答”一栏，以回答一位新泽西读者问题的方式，对“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苏联必将战胜美国”进行了论证。这位读者在来信中说：我读了《苏联生活》杂志1964年第6期乔治·弗拉索夫的文章，他说生产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最关键的因素，那么，按照他的说法，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强。但是，当时苏联的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美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此，《苏联生活》杂志对此进行了辩护，指出苏联会赶超美国，社会主义会打败资本主义。然而这篇文章的解释并没有说服美国人民。在1966年第6期，读者又对“苏联的生活水平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疑问。

苏美青年也是《苏联生活》杂志与美国比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杂志一再将两国青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都是：苏联的青年更有朝气、更有理想，是苏联的未来。1965年2月的一篇文章说，美国的青年读书很少，而且几乎不看报，不像苏联青年那样埋头读书。这篇文章的引起了一位美国青年读者的反对，他认为作者以偏概全。在1965年第6期，杂志刊登了他的来信：“……美国青年人善于独立思考，他们思想活跃，读书更多。美国目前进行的社会运动主要是由活跃、有思想、博学的年轻人进行的。总之，我认为美国青年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学识不亚于苏联青年”。

《苏联生活》杂志1969年第5期，杂志在“回答读者问题”一栏中，回答了美国读者关于苏联青年的一些问题。关于“苏联青年还像10、20年前那样对政治感兴趣吗？”杂志编辑部回答：“事实上，当今的青年人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当今的青年人成长在和平的环境中，但是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并不比生长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青年低。原因在于教育和环境。苏联民主的发展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美国读者提出第二个问题更加尖锐，即“青年是否在共产主义思想和现实之间发现矛盾？”杂志编辑部回答：“在思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正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尽管我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主要差别之一是人民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平等，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苏联人

民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仍然有差距；我们也没有消灭冷漠、官僚作风和贪婪腐化，但随着苏联的成熟发展，我们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使我们确定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代青年见证了苏联集体主义心理的形成，他们理解苏联的努力以及仍需要为理想而奋斗。”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苏联青年的信仰，即“苏联青年信仰共产主义吗？”杂志编辑部回答：“是的，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苏联青年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苏联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欧美发达国家，但是青年人享受免费的教育、医疗、更多的发展能力的机会。他们目睹了苏联的迅速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测验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勃列日涅夫每次讲话中都要到列宁著作中引经据典，却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意识形态日益丧失战斗力和科学性，危机日显。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教条化、凝固化，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动力和活力，导致社会意识形态日益“空心化”，对人民群众失去亲和力和凝聚力。苏共长期以来思想教育的失策，使青年一代理想信念失落，凸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教育群众和引领社会前进的功能。

勃列日涅夫 1981 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认：“重要的是，在宣传工作中不应回避尖锐问题，不要害怕涉及所谓的老大难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回答问题，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点来诬蔑社会主义。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整个思想工作应当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要官样文章，生搬硬套。苏联人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人，如果你对对他们说话不慎重、官腔十足、一味用空话来敷衍搪塞，不联系生活实际，未涉及具体事实，他们就会关掉电视机或收音机，把报纸丢到一边去。”事实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夜间人”现象。“夜间人”又“称双面人”，即人们白天在学校、机关、科学院、工厂或军队里，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行事，处处注意与政府和苏共的号召保持一致，以求升职或加薪。而回到家里，或是来到朋友之间，则阅读地下出版物，与朋友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他们仿佛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孔。这些人实际上是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党内和管理层的异见分子。“夜间人”现象出现于 70 年代，在当时的苏联相当普遍。一位 70 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声称，入学时他没有发现班上有什么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共产党抱怀疑态度，当时班里有团支部、班主任，几乎天天有政治活动，但据他观察，到毕业时不抱怀疑态度的倒成了少数。

由陈之骅主编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还提到这一时期一个特别的社会现象：60 年代人现象。所谓“60 年代人”指的出生于 30 年代大清洗年代，童年时期曾亲眼看到时自己的父辈深受政治运动之扰。这些人大多毕业于 50 年代中期的“解冻”年代，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又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烙印。在批判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气氛中思想逐渐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他们在变化中、矛盾中成长起来，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也有新思潮的烙印。从 60 年代起，他们中的许多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到 70、80 年代，在权力交替中逐渐成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主角。今天，俄罗斯学术界一致公认，正是这些“60 年代人”完成了苏联社会的剧变。他们一方面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力主更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导演了 1985 年开始的苏联改革。苏联社会思潮人道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得到表现。“60 年代人”的典型代表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苏联剧变的直接责任者，而他所用以指导改革的理论思想正是人道化了的苏联哲学，或者说是苏联哲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起了重大不良影响的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对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怀有深刻的敬意，自称与知识分子的会见对他而言比与党务工作者的会见更愉快，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带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他当政时是知识分子与国家领导人最接近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夫人赖莎起了重要作用。赖莎与戈尔巴乔夫 50 年代初先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和法律系。赖莎在哲学系的同学 M·K·马马尔达什维利以及 H·T·弗罗洛夫后来成为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并一直与赖莎保持着密切关系，赖莎本人还对马马尔达什维利的哲学才华推崇备至，现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的弗罗洛夫在改革开始以后很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并且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上述情况使得苏联哲学的人道主义倾向不可能不对戈尔巴乔夫并通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七、本讲小结

苏维埃文化起源于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之中，随即成为苏联的主流文化，在苏联社会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在它存在的 70 余年中，自身包括了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在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代它的象征符号是“红色政权”“红军”“红陆军”“红海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列宁”。在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高涨时代它的象征符号是“斯达汉诺夫运动”“整乡、整村、整个专区加入集体农庄”，在卫国战争时期它的象征符号是“爱国主义”“俄罗斯性格”“潘菲洛夫战士”“为了斯大林！”。在 50 至 80 年代，苏维埃文化仍然雄居绝对支配地位它的象征符号更为丰富，不仅反映在精神层面，如苏联公民的公共优秀品德、社会主义理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族际主义等，更多地反映在物质层面，如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以核武器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苏联在空间技术的领先水平等。

由此，可以看出苏维埃文化的特点是：

- 1、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文化，而非客观型文化。
- 2、苏维埃文化是动员型文化（革命型），而非进化型文化。
- 3、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
- 4、苏维埃文化是通俗型文化，而非精致（经典）型文化。
- 5、苏维埃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但不是全部。

然而，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联的政治文化就始终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部分。主流文化是苏共提倡的文化取向，对内即建立在共产主义目标和族际主义基础之上的“苏维埃文化”，对外即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和世界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非主流文化是 20—40 年代反共反苏势力、60 年代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 80 年代“民主派”提倡的政治文化，其政治取向或者是君主主义的、或者是民族主义的，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或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苏联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作用，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同。20 至 50 年代时期，苏维埃文化为主流文化并居主导地位，50 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和“非斯大林化”后，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加大，70 年代中期后其影响尤为甚之，直至 80 年代中期后直至苏联解体前，非主流文化与原主流文化实际上完成了位移，并且对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停滞”，而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是社会生活在经济、政治、思想观念各方面的全面的停滞，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基本上停留在 30 年代的水平上，把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不知改革进取，无视变化了的时代要求，其他改革各方面的停滞均由此而来。这种思想观念停滞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妄自尊大，闭目塞听。从而根本忽视这样的现象，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苏联非主流政治文化已经呈现潜流汇集，张狂待发之势。

### [建议阅读文献]

[苏]阿·舍甫琴科著，王观声等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80 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贾连义等译：《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英]莫舍·卢因著，倪孝铨等译：《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年版

[英]格雷厄姆著，叶式辉等译：《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苏]麦德维杰夫著，刘明等译：《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秦仲立译：《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陈恕林译：《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澳]L.G.奇沃德著，石宜译：《苏联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英]默文·马修斯著，郑州大学外语系译：《苏俄的阶级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谭得伶等著：《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Алексеев Л.М.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92.

Амельрик А. *Записки диссидента*. Москва, 1991.

*Оттепель. 1957-1959*. Москва, 1990.

*Оттепель. 1960-1962*. Москва, 1990.

Барбакова К.Г., Мансуров В.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вла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Горяев Т.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Москва, 1997.

Горелик Г. *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 Наука и Свобода*, Москва • Ижевск 2000.

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98.

Коротков А.В.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Солженицыне*. Москва, 1994.

Медведев Р. *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Л.И.Брежнева*. Москва, 1991.

Hough J.F. and Fainsod M.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79.

Farmer K.C. *The Soviet administrative elite*. New York. 1992.